

锻钢铁人生 铸大国精器

——记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精彩人生

“人物小传：徐匡迪，193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1959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1995年至2001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同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2003年3月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10年6月，任中美友协会长。”

前不久，我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奖项——光华工程科技奖在北京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荣膺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此奖项自1996年创办以来，每两年颁发一次，其中最具分量的成就奖每届只颁发一人，至今已多届空缺。

曾是我国著名冶金专家的徐匡迪，在数十年人生经历中，多次变换角色。他当过校长、市长，还当过院长、会长。如今，虽已年过八旬，他仍以战略科学家的视角，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作贡献……

回看徐匡迪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不难发现，早年钢铁行业的从业经历，铸就了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力，使得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承受怎样的压力，都能够坦然面对，排除万难，取得胜利。

钢铁报国

钢筋混凝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钢铁年产量仅为几十万吨。在那个以钢铁产量“论英雄”的年代，偌大的中国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业和冶金技术，怎么能行？

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的徐匡迪，1954年考入了当时被誉为“钢铁摇篮”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徐匡迪一直和钢铁打交道，长期从事电炉炼钢、喷射冶金、钢液二次精炼及熔融还原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的冶金技术逐步走向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系列成果，都与他大学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徐匡迪回忆说，学校非常注重实践，从大一开始，冶金专业的学生就要系统地学习并参与炼钢的每一个环节，从最粗重的渣坑清理、平台清扫、撬炉门、堵

出钢孔，一直到炉前吹氧、取样、测温、扒渣、合金计算、补炉等，每个环节的操作都必须掌握。

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徐匡迪总是用“美好”来形容。“虽然今天我们的钢铁冶金技术早已实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这些陈年旧事看似不值一提，但这恰恰提醒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实践中掌握科学技术真谛。”

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已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今上海大学）冶金工程系副主任的徐匡迪被选派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系统研究钢铁冶金技术。对于原本需要3年到5年完成的课题，徐匡迪坚持要在两年内完成。“国家需要我，我必须尽早完成研究回国工作。”徐匡迪对他的导师说。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来不给自己任何休息的机会。“每天两次茶歇，我从来不参加，这样能多工作一小时；每天下班后，我继续加班4个小时。”凭借钢铁一般的意志和信念，徐匡迪奇迹般在两年内圆满完成了课题研究，赢得所有外国专家的认可与尊重。

80年代中期，徐匡迪被邀请到世界著名的喷射冶金公司——瑞典兰赛尔公司做副总工程师。有一次，他通过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炼钢镜判断出其中一炉钢的出钢温度不达标，当时的外国专家都不信。后来结果证明，徐匡迪是对的，由于温度不足导致了近200吨钢水冻在钢包中。从那以后，每当试验炉出钢时，公司总要求徐匡迪用“中国眼镜”看一看温度。

在英国、瑞典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为徐匡迪搭建了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同时也使得这位“工科男”开始关注经济。他坦言，这些经历为他今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1995年，对于徐匡迪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角色转换——出任上海市市长。同年，他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第一位院士市长。

从科研岗位到党政工作的转变，并没有让徐匡迪感到不适应，他很快找到了二者之间互通的连接点。“科研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拿冶金来说，材料断裂是一个宏观现象，科研人员先要分析断口是韧性还是脆性，再分析里面的组织结构有什么问题，用电子显微镜做检测。党政工作则是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需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展开调研，随后找出其中的共性问题，再研究应对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纺织业面临产业转移。有一次，上海国棉一厂的很多工人集聚在车间里，有人哭有人发脾气，因为他们的机器要拆下来运往新疆石河子。知道此事后，徐匡迪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和老中青三代纺织工人面对面交流，倾听她们的心声。在综合各方因素考虑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根据工人年龄段做分流安置，让她们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徐匡迪在上海市市长位置任职的6年里，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得到了深化：成功举办了2001年APEC会议，并在申办2010年世博会中，赢得首轮角逐的胜利，国际大都市的地位逐渐奠定，“臭名远扬”的苏州河得到治理，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这些实事至今为上海百姓称道……

2001年，徐匡迪被调往中国工程院工作，次年当选院长。这时的徐匡迪，已经64岁。他说：“尽管已临

近退休，但是在工程院，我还是小字辈儿，当时院里的很多院士都是我的老师、太老师，我要再一次做学生了。”

站在我国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殿堂，徐匡迪深深地体会到，科学家要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更要善于和跨专业的专家交流，研究共通的问题。任职期间，徐匡迪先后组织了先进制造业、城镇化、人工智能等多行业、跨领域的国家重大咨询工程，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土木、冶金、采矿、地质、水利等工程科技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徐匡迪也清醒地意识到，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之间还有差距。

“我们会制造重型器械，但高端的精密器械少，很多核心和关键的精密元器件还是要从国外进口。这就如同肌肉强壮了、骨骼大了，但心脏和脑子跟不上。我们的科研人员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徐匡迪说，我国需要大国重器，更需要大国精器。

家国情怀

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徐匡迪，从小就蒙受了国破家亡的苦难，父母原本为他取名“抗敌”，希望他将来能够抗敌报国。后来，战争快结束时，小学老师为他改名为“匡迪”，一方面取抗敌的谐音，另一方面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

“应该讲我的家国情怀，和小学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老师大多是从东北流亡过来的学生，家国情怀很深。”徐匡迪说。正是这种流淌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怀，让徐匡迪时时刻刻不忘报效国家，他深知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平是多么重要。

当年在兰塞尔公司的任期结束后，公司曾强烈要求徐匡迪留下工作，开出高薪，还提出把他的夫人和子女接到瑞典，然而被他毅然拒绝。

“我从读中学到大学从来没交过学费、书费，都是政府供的。用那个年代的话说，是党和国家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培养了我，我不能辜负了国家对我的期望。”徐匡迪说。

从瑞典回国之前，时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钱伟长到瑞典出差，住在徐匡迪家里，临走前同他谈了很久。“钱校长讲了很多他当年的经历，国家困难，交通不便，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回国，就是要为国家做点事情。”徐匡迪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感动，几次落泪，下决心一定回国。”

从年轻时的出国求学，到如今获得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徐匡迪发自肺腑地感恩国家和时代给他的一切。他说，科技工作者要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为国家和民族多学习、多储备、多奉献。

温润如玉 刻瓷流芳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王一君在瓷器上直接创作，然后再烧制完成。

闫盛宽摄

国传统文化经典，用一种独特的手法，把中国人的生命意识、自然情怀与陶瓷语言完美结合，将事物初生时的蓬勃之气表达得淋漓尽致。作品造型独特，手法夸张，个性鲜明，极具视觉冲击力，是用现代时尚理念诠释传统经典意蕴的代表。2008年该作品获第五届中国陶瓷产品设计大赛金奖。

“不识规矩门外汉，泥于窠臼是半残”。王一君痴迷于刻瓷却并不拘泥于传统的手段。在创作实践中，他也注重刻瓷理论研究，注重新材料的应用和新工艺新手法运用。经过多次实践，他发明了结晶釉刻瓷、彩釉虚喷背景刻瓷、单刀意刻结合窑变釉综合装饰、鲁青瓷釉下彩新工艺等，尝试用各种手法来增强作品的表

现力。

王一君出生于普通陶瓷工人家庭，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毕业后，便扎进陶瓷艺术的海洋。他的艺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末期，王一君所在单位破产，遂失业。此时，偏偏父母双双患脑血栓住院，医药费无处报销。为了生存，王一君曾在路边租一间房，给人加工刻瓷工艺。

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减弱王一君对艺术的痴迷，业余时间他依然徜徉于陶瓷艺术世界，坚持创作。通过大量实践创作，王一君对刻瓷艺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对生活的感悟。这段经历成了他宝贵的财富，铸就了他开朗乐观的性格。

2003年，王一君被评选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此后，他多次应邀为国家领导人创作国礼陶瓷艺术作品，深受赞誉。王一君说，他是幸运的，有幸遇上许多艺术知音。他也希望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刻瓷创作中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一份力。

2018年5月4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珏迎来了92岁寿辰。王珏饱含深情地向中央党校一次性捐赠了10万元扶贫基金。“不忘入党初心，永葆党员本色。”作为一名入党73年的老党员，王珏表示，奋进新时代，自己也要为党和国家的扶贫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1950年7月份的一天，一列关外的火车缓缓驶入北京。一位戎马书生，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服从组织安排，到中央马列学院（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带着自己简单的行囊，怀揣着振兴国家的梦想，走向新的人生之路。

他就是王珏，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导者之一，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现代公有制理论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他的远见卓识和不计个人得失的勇气，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勇往直前。

92岁的王珏满头银发，面色红润，衣着简单，质朴亲切。他说：“我一直想着让中国的穷人都富起来，也想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去。帮助有困难的人，我特别快乐。”

“我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如果没有共产党，那我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党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他最常念叨的一句话。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胜礼召开之际，王珏向中组部郑重缴纳特殊党费2万元，并以91岁高龄起草了一份近2000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议书，字字句句显示出他为国家发展殚精竭虑的拳拳之心。

1980年，全国党校系统在哈尔滨召开经济学学科年会，王珏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8年，他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典型形态是现代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理论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充分肯定。

离休后，王珏始终关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建设。88岁高龄时，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我见》。他再次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印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深远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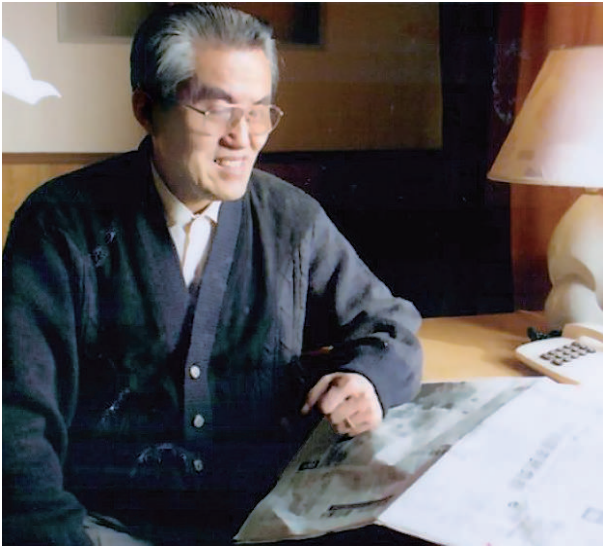
2016年，王珏拿出退休工资存款，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捐款10万元。他希望这笔捐款可以培养更多的年轻学者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队伍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金会以这笔捐款为基础，设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专项基金”，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拓展，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储备人才。

从2013年开始，王珏每月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捐款1000元，2015年增加为每月捐款2000元，以帮助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购置学习用具，资助贫困孩子读书。这些捐款大都汇到了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九保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手中。

受捐助的孩子们常常给王珏寄明信片。“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在您的关心下，我感受到了爱与温暖”“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每次看着孩子们稚嫩的笔迹、纯真的祝福，王珏都开心得像个孩子；孩子们奋发向上的恒心，让他更加坚定了终身捐助的决心。

王珏用自己的工资存款向中央党校捐款，支援定点扶贫地区——河北武邑县和江西安远县的青少年教育事业。当地政府十分重视这笔捐款，各选出25名家境贫寒且品学兼优的高中生作为受资助对象。

正如江西安远一中的受资助学生陈伟萍所说：“您的支持，让我们有机会离梦想更近一步。待日后，我们离开校园，一定尽所能回报社会，接过您的火炬，继续传递这股力量。”王珏这份爱的接力棒，将在孩子们手中传递下去。



王珏经历过苦难，更理解苦难的含义。

李万祥摄

九十二岁老教授王珏持续多年捐助扶贫事业

心系脱贫攻坚 传递爱的接力